

观大势 抓重点 谋发展

——重读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 沈传亮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收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一年半以来的中央工作表示满意，然后就如何适应复杂变化的世界形势、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如何推动平衡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些观点和期望，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殷切期许，体现了邓小平善观大势、善抓重点的政治智慧，至今读来仍深受教益。

要以冷静的态度看待世界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走势非同寻常，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严峻考验。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在1990年3月3日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为此，邓小平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1990年9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时又着重谈了国际问题，他指出，“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正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

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为不可能，还是要有作为”。

从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出发，邓小平就有所作为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世界更加充满公平正义。对中国而言，“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后，他曾多次就市场经济发表看法。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行价格与工资改革初战不利，引发全国性购物风潮，不得已采取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些好做法，甚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也都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对市场经济也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使得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张不开嘴、迈不开腿，经济迅速下滑。1990年中国GDP增速降到4%以下。邓小平提醒中央领导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还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对中国而言，长期搞计划经济留下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个时期内还把搞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何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成为一个难题。针对国内的激烈争论，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行了重申。

理论和实际都已表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硬挂钩主要是人为因素，亦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在邓小平指引下，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大胆冲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展开。邓小平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那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

坚持社会主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避免出乱子，保持社会稳定，抵制住资本主义的进攻，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着力解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出沿海发展起来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88年他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客人时，他又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90年12月24

日，他再次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我们不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注意解决分配公平问题；我们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效缩减了区域发展差距，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凸显公平，使得全体国人共享改革成果。

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1990年12月24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一以贯之讲要抓好党的建设，明确强调要有个好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他指出：“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确实，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变化，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精力充沛、有着高超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邓小平还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既点明了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要，也意味着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

邓小平多次论述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国家大局稳定，确保了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重读经典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县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费孝通学术研究成果就很，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出版有《行行重行行》《乡土中国》《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90年，费孝通在80岁诞辰聚会上，应中根千枝和乔健教授邀请，作了题为《个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发言，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探讨自身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此后，费孝通将其推广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层面，阐述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十六字箴言以质朴、鲜活的语言，展现出人类学家费孝通从个体到社会、从中国到世界的胸襟与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扎根中国实践

十六字箴言源于费孝通与其英国留学时的同学利奇关于人类学治学理念的对话。费孝通的老师、现代人类学实证研究的开创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是对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他的同学利

美美与共：从中国到世界

——费孝通的治学理念

□ 庄晨燕 浦天龙

奇也持相似观点。在他们眼中，“人类学是表演才华的戏台，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研究或者治学纯粹基于个体需求，仅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路径。在费孝通看来，他们的观点和选择在英国社会无可厚非，自己作为20世纪初出生的中国学者，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意愿予以效仿。费孝通回想放弃医学改学人类学的初衷，归根结底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的情怀。费孝通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来理解与英国同行之间的分歧，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人类学学科的魅力正在于此。

费孝通心怀天下的治学担当具体体现为以科学方法理解社会、改造社会、造福民众。作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剧变的亲历者，费孝通始终以国强民富为治学宗旨，他认为读书治学绝非仅仅陶冶情操、自娱自乐，而是为国为民，将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有机融合。他紧跟时代步伐，将社会人类学实证方法应用于快速演进的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是早期的大瑶山、开弦弓村研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研究和发展研究，费孝通坚持深入基层社会，融入民众生活，亲

力亲为参与调研、深度访谈，在扎实、鲜活的第一手实证资料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提炼。历数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小城镇大问题》等中国社会科学史上的名著名篇，从选题到结论，费孝通总是能够以敏锐的视角抓取关键议题，以坦诚的笔触展示民心民情。这些研究不仅在推动学科进步方面具有开创意义，而且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扎根中国实践，以实证调查为立身之本的治学方法让费孝通70岁高龄重拾学术之路，在此后20多年里带领青年学者团队走遍中国沿海和中西部地区，探索国家可持续发展、人民富足安康之路。时至今日，费孝通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依旧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敦促众人将目光投向不断演进的国情民情，用所学知识投身于国家和社会进步。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与“多”

费孝通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1935年大瑶山瑶族社会考察期间，与

瑶族人民一起生活，亲身体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各美其美”是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并不一定美……民族间能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交往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美人之美’境界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了我们古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归根结底，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最后到“天下大同”层层递进、步步提升，其精髓在于共同体中“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1949年，面对建立各民族平等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求，费孝通将研究重点转向民族研究。他依然坚持社会人类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翻山越岭深入中西部少数民族村寨，在与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共同生活中理解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含义，在此

用典释义

爱人利物之谓仁

【讲话原文】

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爱人利物之谓仁。”疫情无情人有情。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8日）

【出处】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者，则韬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

袁天；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已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战国》庄周《庄子·外篇·天地》

【解读】

“仁”是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道家亦讲求“仁”，这是儒、道思想契合之处。但儒家所说的“仁”主要是对人而言，庄子的“齐物论”则将“仁”推及万物：“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对“仁”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不仅要“爱人”，而且还要“利物”。所谓“利物”，即要爱护自然界所有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充分体现了道家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

“爱人利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西方利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他借“爱人利物之谓仁”这句古语诠释生命至上理念，强调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杨立新）

费孝通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拓展至全球视野之下，阐述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认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日渐深化的过程。今天的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文明都在频繁的互动交流中汲取对方文化，将其“消化”后纳入自身体系。这一事实为超越零和博弈，在更高层次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提供了条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展示了未来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全新图景，即每个文明借助“文化自觉”反省自身，获得“自知之明”，摆脱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在此基础上欣赏、尊重其他文明，不同文明交流融合形成更高层次的结晶，即“美美与共”之后达成的“天下大同”。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尝试走出去，开拓国外社会文化研究，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为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对话、交流创造条件。“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人类的各种文化中，都可能隐藏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我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本意之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日益深入，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同时也应该研究海外社会。十六字箴言为协调中国研究和海外研究提供了方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而不同

2004年8月，在“北京论坛”《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的书面发言中，